

王安石集外文《许旌阳祠记》考析*

刘成国

现存通行的王安石文集包括《临川先生文集》和《王文公文集》两大版本系统。前者又分为源自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詹大和临川刻本,以及源自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珪的杭州刻本,两种刻本基本相同;后者则是源自南宋的龙舒刻本。两大版本系统所收诗文篇目及编排体例出入较大,但遗缺漏收的情况都比较严重。以下拟就一篇王安石集外文的真伪进行考证,并阐述其学术价值。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八《艺文·祠记庙记》载有一篇《许旌阳祠记》,题“临川王安石”撰。此文不见于《临川先生文集》和《王文公文集》两种文集版本中,全文如下:

许旌阳祠记

临川 王安石

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济斯世,则将效其智以泽当时,非所以内交要誉也,亦曰士而独善其身,不得以谓之士也。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故道日丧而智日卑。于是有不昧其灵者,每厌薄焉。非士之所谓道者,名不副其实也,亦以所尚者非道也。呜呼,其来久矣!

晋有百里之长曰许氏者,尝为旌阳令,有惠及于邑之民。其为术也,不免乎后世方技之习,如植竹水中,令疫病者酌水饮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诚之所致也。而藏金于圃,使囚者出力而得之,因偿负,而或免于桎梏,岂尽出方技之所为者?以是德于民。既后斩蛟而免豫章之昏垫,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则公之有功于洪,论者固自其道而观之矣。夫以世降俗末之日,仕于时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谓晦冥之日月矣。公有功于洪,而洪人祀之虔且久。祥符中,升其观为官,而公亦进位于侯王之上。于是州吏峻其严祀之官室,与王者等,兹固侈其功而答其赐也。工弗加壮,中焉以圯,今师帅南丰曾君巩慨然新之。巩,儒生也,殆非好尚老氏教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荆公年谱长编》(12CZW057)阶段成果。

者。亦曰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礼经》然也。国家既隆其礼于公，则视其陋而加之以丽，所以敬王命而昭令德也。书来，使余记之。余尝有感于士之不明其道而泽不及物者，得以议吾儒也，故于是举，乐为之述焉。^①

管见所及，最早注意到这篇佚文的是日本著名学者秋月观暎。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从光绪本《逍遥山万寿宫志》、《道光南昌县志》中发现了此文，并对之作了简单的介绍^②。或许是因为他对此文的真伪未加考辨，也或许是语言的隔阂，《许旌阳祠记》一文并未引起国内文史学界的注意。那么，此文是否真为王安石所作？

在通行的《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两种王安石文集版本中，均有数量不菲的他人之作孱入^③。此篇虽然未收入文集，但可肯定的确出自王安石之手。首先，从相关文献著录来看，除《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外，清陈宏绪《江城名迹》卷三“妙济万寿宫”也有此篇存目：“宋临川王安石有《重建许旌阳祠记》。”清金桂馨、漆逢源所撰光绪四年江右铁柱宫刻本《逍遥山万寿宫志》卷十五亦录有此文，题为“重建许旌阳祠记，临川王安石”^④。所收之文文末较《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多出“元丰三年八月既望”八字，《道光南昌县志》同。《古今图书集成》卷二百八十一《神异典·道观部·艺文一》录有此文，文字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全同。

其次，文章中对《许旌阳祠记》撰述缘起等相关内容的叙述，是可靠的。文中“许旌阳”，指晋代著名道士许逊，即许真君，《云笈七签》卷一百六有传，曾任旌阳县令。许旌阳祠，《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十载：“在广润门东，即万寿铁柱宫，以祀晋旌阳令许逊。”故文中谓：“公有功于洪，而洪人祀之虔且久”。文章提及“（旌阳祠）中焉以圯，今师帅南丰曾君巩慨然新之”。“师帅南丰曾君巩”，即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的至交曾巩。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曾巩权知洪州军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故文中称以“师帅”。《曾巩集》中有《祭西山玉龙观许真君》曰：“阴功及物，灵德在天。缅惟真驭之升，实以中秋之序。人承馥烈，岁即遗祠。故兹守土之微，敢体爱民之素。俾往陈于薄具，尚永庇于群生。”可以从侧面印证“今师帅南丰曾君巩慨然新之”。

第三，从文章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是一篇记体文，本应以叙述为主；但文章却先以议论起笔，振起全篇，叙述简明，论旨高远，峭直峻洁。这种写法，很符合

①《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75-576页。

②秋月观暎著，丁培仁译：《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③从晚清开始对王安石诗文的辑佚工作，有时也误将他人之作辑入。这方面最全面的综述，可见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327页。

④《逍遥山万寿宫志》卷十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第十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77页。

王安石记体文的一贯风格。今《临川先生文集》共收录王安石记体文 25 篇,其中 15 篇是以议论为主,记叙为辅,属于典型的“记之变体”,且多为名篇。更重要的是,《许旌阳祠记》议论的焦点,是借表彰道教的许逊,来探讨儒家士人的出处之道,即士人应当以行道济民为己任,否则,“士而独善其身,不得以谓之士也”;并且批评儒士之堕落,导致世衰俗靡:“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故道日丧而智日卑。”而这一点,正是王安石文章中的一个独特主题^①,在其文集中屡见不鲜。如,《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三《扬州龙兴讲院记》表彰苦心孤诣、丐食建庙的浮屠慧礼,进而抨击儒士不能自振:“今夫衣冠而学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离性禁欲,若彼(浮屠)之难也。而士之行可一乡、才足一官者常少。”

如上所述,此文确系王安石之作。如文中所述,当是宋神宗熙宁末年,时知洪州的曾巩修缮洪州西山的许旌阳祠,然后向好友王安石求文以记,“书来,使予记之”;迟至神宗元丰初,王安石撰成此记。

然则《许旌阳祠记》价值何在?首先,此文是王安石熙宁末年退居江宁后,迄今为止仅见的两篇记体文之一,另一篇《庐山文殊像现瑞记》撰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篇幅远逊于此篇。晚年的王安石文学创作重心已明显转向诗歌,除了一些日常书启章奏之外,序、记、论、说等体裁已经罕睹。就文体而言,《许旌阳祠记》堪称王安石晚年的一篇大作,它为我们理解王安石的创作历程演变,补充了重要资料。

其次,此文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王安石晚年的思想趋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最值得注意的是,《许旌阳祠记》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济斯世,则将效其智以泽当时,非所以内交要誉也,亦曰士而独善其身,不得以谓之士也。”按照儒家传统的教条,儒士应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通常是指仕宦的显达。此处王安石却对这一儒家经典价值观提出了挑战:独善其身者,不能称之为士;士人即便不能出仕,也当运用其智力,润泽当时,这也是行道的一种表现。这无疑是对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在科场竞争愈演愈烈、士人入仕越发艰难的北宋后期,王安石对士人价值观、士人身份的这一重新界定,具有重要的社会史、思想史意义^②。继而文章对儒道沦丧、士风不振提出批评:“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故道日丧而智日卑。”这又重申了熙宁八年(1075)六月他在《除左仆射谢表》中对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反思和抨击:“窃以经术造士,实始盛王之时;伪说诬民,是为衰世之俗。盖上无躬

^①见拙著:《荆公新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6页。

^②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另有《反常合道——王安石的翻案之作与士人出处之道》专门探讨,此处不赘。

教立道之明辟,则下有私学乱治之奸氓。然孔氏以羈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燼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诡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显然,以上都是在为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氏新学进行学术合理化的论证。

再次,由此文我们可以窥见北宋士大夫们在面对宋代民间信仰时的两种不同的典型立场。一种是较为开放的、以调适为主的姿态。王安石高度肯定了道士许逊的一系列利民之举,如巧治民疫、藏金免囚、斩蛟去灾等,并着力淡化这些善举中的方术色彩,为其注入一种儒家理想成份,展示出以儒家为主、融汇百家的一贯主张:“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以世降俗末之日,仕于时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谓晦冥之日月矣。”至于文章谓:“巩,儒生也,殆非好尚老氏之教者。亦曰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礼经》然也。国家既隆其礼于公,则视其陋而加之以丽,所以敬王命而昭令德也。”这段文字,既是委婉地为曾巩身属儒士却修缮道教许旌阳祀进行辩护,即:曾巩之举,只是遵循《礼经·祭法》的教导而已——“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同时又含蓄地表达出曾、王二人在对待异教信仰上的不同:曾巩恪守儒家之藩篱,而王安石却出入百家,以儒为主,唯理之求:“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①曾巩以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待民间信仰,有灵则祭祀之;而王氏却试图结合儒家的理念对之加以容纳、调和。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①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稀见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4页。